



# 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

高培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预期管理,多次就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作出重要论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尽量控制和减少阵痛,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2024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and 党中央决策部署可以发现,跳出需求或供给管理的视野局限而深入到预期管理层面,从需求、供给、预期管理三者结合的意义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推动经济运行和预期持续向好,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头戏”。

##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范畴。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具有显著的“预期驱动”特征。我们常说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现实生活中集中体现为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无论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围绕市场价格作出的经济决策都离不开预期。所谓“买涨不买跌”“看涨买跌”等,表达的大都是基于预期的交易或投资策略。就此而言,与其说经济决策是依据市场价格信号作出,不如说经济决策是依据市场价格走势判断即预期作出。作为深刻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预期不仅直接关系企业投

资经营决策和居民消费行为,而且直接关联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预期经济。

各国经济发展轨迹表明,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结构持续多元,与外部融合加深和治理复杂程度加大,预期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以及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显著而重要。不论是围绕预期管理的理论研究,还是围绕预期管理的实践探索,都是伴随着预期管理影响的加深和预期管理重要性的上升而展开并发展起来的。比如,行为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证实并细化了人的复杂情感体验对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为实施预期管理奠定了微观基础。又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国际大流行等突发事件冲击,以管理预期为主的政策工具从含糊、目的不甚明确的沟通转向越来越强调透明度和可信度。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现象,表明了预期管理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格局正在经历这样一种变化。以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多可归因于社会总供求失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又集中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虽然同样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但顺藤摸瓜,透过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总供求失衡现象可以发现,“国内供需需弱矛盾突出”的背后有预期偏弱、社会信心不足的因素。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也是全新挑战。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预期变化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征。特别是负面预期,往往会加速放大,甚至会引发心理恐慌。因此,引导具有基础性的预期变化,已

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面,并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心向预期管理迁移,进而越来越呈现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预期管理协同发力、同频共振的显著特征。预期管理已与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等宏观经济治理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依存、互为条件,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 统筹供需矛盾平衡和预期管理

坚持问题导向是推进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在科学分析、冷静研判的基础上抓住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找准宏观调控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才能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当前,预期偏弱、社会信心不足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显著矛盾之一,也是宏观调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2021年中央工作会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重要判断。事实上,“三重压力”不仅是问题和挑战,更是观察分析问题和挑战的角度。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总供求失衡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这意味着,必须将预期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视野,在既往聚焦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预期因素分析,形成“供需分析+预期分析”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通过“分析视野拓展”,系统提升捕捉和刻画预期动态发展的能力。具体而言,单纯供需分析聚焦的问题和挑战往往相对简单,加入预期分析之后所聚焦的问题和挑战要复杂得多;既有需求不足或结构失衡这样的“老”问题,也有预期偏弱、社会信心不足这样的“新”挑战,宏观经济

分析要在两个层面同时着力。

面对当前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复杂现象,既要统筹社会总供求失衡问题和预期管理问题,坚持“老”问题和“新”挑战一起分析、一起监测,更要聚焦“新”挑战着重发力;不仅要关注供给、需求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要关注预期、信心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机理;不仅要分析供需客观条件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逻辑,更要分析预期等主观因素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要建立健全多维度、全口径的预期监测体系,更要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各类经营主体、各类居民群体、各类就业群体的全面覆盖以及包括经济增长预期、就业与收入预期、物价与通货膨胀预期、投资与消费预期、金融市场预期等各类指标的全面覆盖。换言之,缺少了预期因素的分析过程,对经济运行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忽视了预期因素的分析结论是不牢靠的。

## 同时设定供需平衡目标和预期引导目标

对症下药是做好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宏观调控如同医生用药治病,只有在仔细分辨“病灶”“病源”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定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并开出药方,才能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把预期因素加入宏观经济分析,在有利于精准捕捉、细致刻画预期动态的同时,一个更基本、更深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预期引导:稳定预期、提振社会信心。同样一项调控举措,如果预期引导做得好,预期稳定、社会信心提振,就可能产生调控举措的“放大效应”;反之,便可能造成调

控举措效能打折扣。因此,必须将预期引导纳入宏观调控目标配置。在既着眼实现供需平衡的基本目标基础上,加入预期引导目标,形成“供需平衡+预期引导”的宏观调控目标配置,系统提升预期管理和引导能力。具体而言,着眼供需平衡的调控目标往往相对简单,加入预期引导之后则复杂得多;既有扩大需求或优化结构这样的目标,也有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这样的目标,宏观经济调控要在这两个层面同时着力。

面对当前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的矛盾现象,要同时设定供需调节目标和预期引导目标。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同需求、供给有关,而且还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对策同预期、信心有关;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有助于扩大需求、优化结构,而且还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对策有助于稳定预期、提振社会信心。倘若仅关注供需调节而遗漏预期引导,或是相反,不仅难以除去“病灶”、根治“病源”,还可能因药不对症而产生副作用,甚至留下“后遗症”。换言之,健全预期管理机制须以预期引导进入宏观调控目标配置、确保不遗漏预期引导为前提。缺少了预期引导的宏观调控目标配置是不完整的,而且遗漏了预期引导的宏观调控举措组合也难脱药不对症之嫌。

## 协同推进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

改革与政策是做好宏观经济治理的双引擎。实施宏观调控是依托于政策支持还是依托于改革创新,抑或同时依托于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取决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只有在找准必须解决的

## 顺应科研范式变革趋势

#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伍爱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科研范式与产业变革的底层逻辑,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我们要顺应科研范式变革趋势,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应用的串联融合或者线性叠加,而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资源配置、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相互嵌入、价值共生。传统科学研究依赖人类的经验积累与线性试错,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周期长、成本高,研发与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现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明确的主体区分,比如科学研究以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为主,技术研发以企业为主。这导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融合通常遵循“技术供给推动”或“市场需求拉动”的单向线性叠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研范式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并呈现出“科学突破—技术开发—产业回报—反哺科学研究”并轨式互动循环模式。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应用的周期大幅缩短,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特征愈发明显,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边界越来越趋同,甚至部分科学正在变成技术,如材料科学、基因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

总的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路径正加速从“单向线性推进”向“双向互动循环”演进。这对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突破传统的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之间畅通流动、高效配置,实现创新要素与产业需求在时空上的有效匹配。这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的保障。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生

态等,能够有效统筹各类创新资源要素,从而加快科学发现、前沿技术突破,将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坚决破除束缚科技创新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大幅提升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同时也要看到,与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滞后于科研范式发展需要,创新投入还不够均衡,创新要素流动还存在跨领域跨区域壁垒,等等。更好顺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潮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推动无缝衔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才能更好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并完善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体现以实际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的有机结合,激发出“从0到1”的创新。探索构建企业、高校、政府联合研究模式,落实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基础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通道,缩短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周期,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中试验证平台等,打通“从1到10”的系统性验证环节。发挥科技领军企业优势,集成各方面创新资源,打造以链主企业为核心的开放式创新生态,加强对产业场景的验证,推动技术标准与产业需求对接等,加速实现“从10到100”的规模化落地与场景应用。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是一个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在内的复杂系统。通过深入整合人力、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推动不同主体协同创新,能够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水平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撑,进而实现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加快打造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这主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并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可探索培育龙头企业牵头、中小企业配套、科研机构赋能、用户单位参与的开放共享场

景生态,凝聚多元共合力。推行“高校导师+产业导师”双导师制,加速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部门之间的顺畅流动。根据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不同阶段需求配置金融要素,根据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科技型企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加强创新要素协同,可搭建科学数据库和大数据交流平台,促进数据要素开放共享。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共享,推动科技成果更好转化,多措并举促进科技创新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

**完善科技管理体制。**作为为实现科技发展战略目标而建立的制度体系、组织架构及运行规则的总和,科技管理体制既是科技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也是创新活动有序开展保障。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对于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高效配置各类科技创新资源,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实施好重大科技项目。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包容审慎”的科技监管体系,对新技术新业态实行“沙盒监管”。创新“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模式,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打破“唯论文、唯职称”的评价导向,推动在研发组织、考核激励、人才使用等方面实施更有突破性的制度机制。创新知识产权分成模式,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使用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明确关键知识成果归属,激励企业面向未来产业和颠覆性技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探索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探索并推广“先赋权后转化”“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方式,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及成果转化积极性。

(作者为上海航天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

为官避事平生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绩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

所谓“四平八稳”,绝非在推动工作上行的稳致远,而是一种消极避责的政治投机。这些“太平官”深受“洗碗效应”误导,将个人仕途的“绝对安全”凌驾于事业发展的实绩实效之上,在矛盾面前“打太极”,在职责面前“击鼓传花”,以此换取个人利益的“绝对稳妥”。他们在政策执行中甘当“复读机”,热衷于追求过程的形式闭环,而非结果的突破进展。这种“只有姿势、没有力度”的表演式“最后,让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最后一公里”失去效果。在基层实践中,“太平官”则成为“柔性梗阻”。面对群众诉求,由过去的“生冷硬”转向隐蔽的“礼貌推”,利用冗长的调研论证、流程审批等构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壁垒,将民生期盼悬置在“行政速官”中。这种慢作为、不作为,不仅拉开了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太平官”现象的产生,是个体的政绩观偏差与评价机制失衡相互影响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

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直击病灶:当私心杂念侵蚀党性,部分干部便陷入“不洗碗就不掉碗”的逻辑误区,将攻坚使命精算为仕途风险,从而产生“多做多错”的思维偏差。赏罚不当,则勤慢不分;激励失准,则避事成风。当问责压力与正向激励形成“非对称结构”,当考核指标偏离实绩而陷于机械留痕,平庸无大过的潜规则便客观上为“太平官”提供了“避风港”:原本应冲锋陷阵的闯将,往往会在复杂的利益算计中,退缩为唯唯诺诺的守成者。

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太平”,是一场涉及机制重塑、导向校准与思想洗礼的整体战、系统战。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通过制度化的边界界定为改革创新者、踏实肯干者、默默奋斗者鼓劲撑腰,让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庸官没有市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的准星从“材料留痕”真正转向“实效至上”,通过差异化考评和穿透式评估,让滥竽充数者失去市场,让勇于破冰者站上舞台,真正实现凭实绩排座次、以实干论英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唯有将造福人民的价值基准深深嵌入灵魂,使之成为超越“守摊子”心态的精神坐标,广大领导干部才能在各种风险交织与利益博弈面前,真正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 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

李学敏